

文化产品

通榆年画

通榆年画又叫木版年画,是闯关东的民间艺人带到东北的,所以又叫闯关东年画。

通榆年画最初的传承主要以李向荣家族传承为主。李向荣的曾祖父李祥1868年由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千佛山迁至通榆。他把木版年画的技艺传给了后世子孙,传承脉络为曾祖父李祥—祖父李连春—父亲李兴亚—李向荣。

通榆闯关东年画早期以传统年画为主,并以喜庆吉祥、驱邪打鬼等民间题材为主,主要分为三类:财神类有“财神”“福寿双全”“四季平安”“五路进财”等,胖娃娃类有“五子登科”“观音送子”等,民间类有“门神”“灶神”“水漫金山”等。

新中国成立后题材多以喜庆喜庆、民间风俗、民间故事为主。

1961年,开通公社文化站美术辅导干部刘长恩创作了一张名为《打猪草》的年画,张贴在公社文化站的画廊里。时任吉林人民出版社年画编辑室主任的吴龙才先生来通榆组稿,发现了这张画作。这张年画出版发行后,成为县内出版年画之首。嗣后,《打猪草》在香港印刷技术展览会上展出,还被长

春电影制片厂选作故事片《两家人》道具。1962年至1965年,发行通榆年画11幅,宣传画1幅。

1976年10月,通榆年画创作重新兴起,至1979年共创作年画39幅。1980年至1985年,在全县创作出版的30幅年画中,1幅获全国二等奖,2幅获省一等奖,4幅获省二等奖,9幅获省三等奖。

在专业美术工作者的带动下,全县业余美术创作取得了可喜成果,最多时从事创作的人员达100多人,每年创作年画作品数百幅,先后有10人的年画作品出版发行或参加省群众美展。

在数量上升的同时,通榆年画的技法也不断发展和创新,既继承传统又不墨守成规。从传统画法到擦笔年画,从一擦到底到擦画结合,从半透明水彩到透明水彩,以至水彩技法、国画技法的融入,画面饱满与大胆留白的交汇,民俗风格和现代韵味的互补,使通榆年画在年画界一枝独秀。

经过多位年画作者的努力,全国有十家出版社出版发行通榆年画300余幅,通榆年画在全国年画领域有较大影响。1991年6月25日,通榆县被命名为“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白城市文联供稿)



刘长恩《打猪草》



安学贵《家访》

谷学忠《快乐的暑假》

白城记忆

曾侯乙编钟“乔迁”新居

随着湖北省博物馆三期扩建工程即将全面竣工,10月12日起,博物馆“镇馆之宝”——拥有2400多年历史的曾侯乙编钟“搬家”工程开启。

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是由大小渐次变化的青铜钟编组而成的打击乐器。至今,曾侯乙编钟仍是中国出土数量最多、重量最重、音律最全、气势最为宏伟的一套编钟。

图为10月15日,工作人员对曾侯乙编钟进行调试安装。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吉林省是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

●刘信君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和考察调研时反复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把红色江山世代传下去。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系统梳理红色文化、赓续传承红色基因,为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汇聚磅礴力量。本报从今日起转载《吉林日报》近期推出的“聚焦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专栏稿件,从吉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三地”和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三摇篮”六个角度破题,讲述中国共产党带领吉林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浴血奋斗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展现吉林儿女的感人故事、崇高信仰和家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后,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的潮头,组建了英勇善战的东北抗日联军(下简称“东北抗联”),涌现出以杨靖宇、魏拯民、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等为代表的民族英雄,成为东北抗战的中流砥柱。吉林省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率先垂范,开拓创新,成为东北抗联的创建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一、高举旗帜,率先建立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九一八”事变后,山河变色,国土沦丧。在这场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民党先是命令东北军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军和警察大部分不战而降,或退往关内;后又把希望寄托于“李顿调查团”,企图利用帝国主义的争斗,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国民党这种举步失措的政策使东北民众自发的抗日斗争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抗日力量受到严重的损害。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高瞻远瞩,制定了东北抗战的指导思想,组建东北抗日武装,成为东北抗战的中流砥柱。

1931年9月19日,即“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的宣言》,明确提出了“发动游击战争”“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了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要求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进行7项工作,“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他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了《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中心思想是号召士兵群众,奋起抗日;发动工农,反抗日军进攻;开展农村的武装斗争等。1932年3月31日,中共满洲省委作出《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的决议》,提出我们党的任务是“大规模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宣传群众,扩大这一反帝战争,建立民众的苏维埃政权,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通过下发的系列指示、宣言、决议,确立了东北抗战的指导思想,即号召东北民众组织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尤其是开展武装的游击战争,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

鉴于吉林省是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为了沉重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率先在吉林省建立了自己领导之下的抗日武装。1931年12月,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在工农赤卫队和特务队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抗日武装——磐石赤色游击队,李红光任队长,李松波任政委。1932年,为了加强对这支抗日队伍的领导,中共满洲省委先后派张振国、杨君武、杨林、杨靖宇到磐石,开展抗日工

作。他们联合抗日山林队,领导群众分粮斗争,组织伪军哗变,攻打磐石县城,粉碎日伪军四次进攻,成功策反迫击炮连起义,可谓声名远播,威震南满。在此过程中,磐石赤色游击队先后改名为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东北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成为南满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

同时,中共海龙中心县委于1932年8月,成立了海龙工农义勇军。1933年1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七军海龙游击队。8月,海龙游击队北上,与南满游击队会合。在此基础上,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中共东满特委于1932年4月至1933年1月,成立了延吉反日游击队、珲春反日游击队、和龙反日游击队、汪清反日游击队、安图反日游击队。1934年3月下旬,延吉游击大队、和龙游击大队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

鉴于各支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的发展,中共满洲省委于1934年11月7日率先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1935年5月30日,又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兼任政委。

与此同时,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为结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主张,并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将率先加入抗日联军。据此,1936年6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3月上旬,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委。7月上旬,中共南满省委成立,魏拯民任书记。同时,东北抗联第一、第二军合编为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总政治部主任。

由此可见,东北抗联的最前身是东北党组织创建和领导的反日游击队,磐石赤色游击队是中共在东北建立的最早的抗日武装;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是中共在东北建立的成军级建制的抗日武装;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也是中共最早建立的路军。即东北抗联经历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三个阶段,每个发展阶段的开端都在吉林省。尤其是中共南满省委和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的成立,标志着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首先在吉林省实现了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的统一,同时对吉东和北满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吉东省委成立于1937年3月,第二路军成立于1937年10月10日;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于1936年9月18日,北满省委成立于1939年4月,第三路军成立于1939年5月30日)。

二、英勇奋战,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威震南满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成立后,积极从事建立东北游击根据地的工作,并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不断给日伪法西斯统治以沉重打击。

关于抗日游击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争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从1932年至1942年,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南满、东满等地创建了众多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在南满,杨靖宇先后建立了以红石砬子、玻璃河套为中心的磐石游击根据地,以濛江、桦甸和抚松边界的河里抗日游击根据地,以桓仁、本溪、兴京(今新宾

县)交界的老秃顶子、和尚帽子为中心的桓本兴抗日游击根据地以及辑安(今集安市)老岭山区的蚂蚁河游击根据地。在东满,王德泰、魏拯民等建立了安图车厂子、奶头山,汪清罗子沟以及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东北抗日战争的后期,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在深山密林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便于生活的地方,广建密营,开展原始森林游击战,挑战人类生存极限。密营是东北抗联建立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根据地。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说的“长白山根据地”,就是指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所开创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依托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了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如举行两次西征、奇袭老岭隧道、诱歼伪军索旅、巧夺辉南城、破袭通辑路,攻打大蒲柴河、大战寒葱岭等。为此,杨靖宇激情澎湃地写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这一次的民族革命战争,要完成弱小民族的解放运动……冲锋啊,我们的第一路军!冲锋啊,我们的第一路军!”

在实际斗争中,杨靖宇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军事原则,如“四不打原则”“三大绝招”“四快”,以求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因此,杨靖宇被称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杨靖宇的战略战术是在对日作战中摸索出来的,是在逐渐与中共中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失去联系后和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后独立自主形成的,体现了实事求是、勇于创新、不拘一格、灵活机动的特点。

对于东北抗日联军的作用,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东三省的游击战争……在抗战起来以后,配合的意义就明显地表现出来了。那里的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至其给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首创首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是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历史性功绩。吉林省是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早形成的地方,并对活动在黑龙江省的其他抗联各军起到引领作用。

1932年底,日伪军展开大规模“讨伐”,义勇军主力大部分溃散,东北抗战步入低潮。面对东北严峻的斗争形势,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再次挺身而出,开创性地提出建立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指明了东北抗战的方向。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下简称“中共代表团”)发出“一·二六指示信”,明确提出:“尽可能造成全民族的(计算到特殊的环境)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1935年6月,华北危机日益加深,中共代表团针对东北抗日斗争的实际情况,起草了“六三指示信”,提出坚持长期抗战思想,重申扩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张。1935年7月,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撰写了“八一宣言”,完整地

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全国考古工作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充分肯定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成果和贡献,对广大考古工作者寄予殷切期望。

考古学是根据发掘出来的或古代留传下来的遗物和遗迹来研究古代历史的学科。而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古国,有着无数的文明之秘、历史之谜需要破解。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考古工作在中国大有可为的光明前景。

100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增进了公众对中华文明的认知,促进了文明交流互鉴。王国维先生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之初曾言:“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这是文化之幸、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些重大考古发现凝结着几代中国考古人的心血与汗水。他们躬身田野,胼手胝足,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克服困难,排除干扰,叩问厚土,满怀报国之心,仰望中华,求索文明之秘。当走进一座座规模宏大的博物馆,观赏一件件叹为观止的文物时,我们不能忘记考古工作者所作出的贡献。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中国人以深厚的历史传统为荣,也以历史传统为鉴。考古工作绝非“挖宝”,文物价值也绝非金钱可以衡量。考古工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事实,更好地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从而坚定文化自信,生发出无比强劲的内在定力和前进动力。

文化兴,国运兴。中国从考古大国向考古强国的迈进,其基础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高度重视考古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工作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对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作出了专门部署,就做好我国考古工作和历史研究,用好考古和历史研究成果,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下一个百年,中国考古将帮助国人更为全面地了解中华文明史,更好地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广大考古工作者要不负嘱托,增强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发扬严谨求实、艰苦奋斗、敬业奉献的优良传统,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

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乃至全社会都要牢固树立保护文化遗产责任重大的观念,关心爱护考古工作者,积极支持保障考古事业、文物保护和历史研究。

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战略,主张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率先在吉林得到贯彻与实践。1933年7月,杨靖宇联合反日义勇军建立了南满反日军联合参谋部,任政治委员。1934年2月,杨靖宇组建了下辖17支抗日武装4000余人的“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并当选为总指挥。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出现“东北抗日联军”的名称。同年秋,在王德泰倡议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与10余支抗日武装召开大会,组建了东满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推举王德泰为指挥。1935年9月2日,《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公布,第一条即为“东北抗日联军由东北人民革命军、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及抗日山林队等等共同组织而成,取消原来各军名称而称为东北抗日联军第X军第X师第X团”。1936年3月至193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相继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十一军,最盛时人数为3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的编成,标志着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在此过程中,杨靖宇、魏拯民、王德泰作出了表率 and 贡献。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队伍中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团结起大多数抗日力量,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对全国抗战产生了影响。更重要的是,其经验教训对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四、靖宇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习总书记曾说过:“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正所谓“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在东北抗日战争中,牺牲在吉林大地上的民族英雄杨靖宇、魏拯民、董长荣、王德泰、陈翰章、曹国安、曹亚范,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黑暗的夜空,成为人们抗亡图存的航灯。而杨靖宇则是东北抗联的旗帜性人物,以他名字命名的“杨靖宇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靖宇作为东北抗联的缔造者、指挥者之一,他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同时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委员、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33人名誉主席团成员之一、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提到最多的抗日英烈之一,在党内具有崇高的地位。

杨靖宇率领所部在日本侵略者残酷统治下的南满、东满地区,一直开展着英勇顽强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直至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杨靖宇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杨靖宇精神”。其内涵有六点:即勇赴国难的爱国情怀,绝对忠诚的理想信念,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战天斗地的艰苦作风,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团结战斗的大局观念。这六个精神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爱国情怀是“杨靖宇精神”的基础,也是核心;对党绝对忠诚是“杨靖宇精神”的力量源泉,也是精华所在;英雄气概、艰苦作风、创新精神、大局观念是“杨靖宇精神”的具体体现。“杨靖宇精神”与东北抗联精神具有高度的契合性,是东北抗联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精神谱系中最耀眼的精神之一。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实现我们的目标,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可以说,“杨靖宇精神”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动力之一。

总之,吉林省作为东北抗联的创建地,以其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率先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最早建立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最先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最具影响的“杨靖宇精神”等而对东北抗日战争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其历史贡献必将彪炳史册、光耀千秋。

(据《吉林日报》)

聚焦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脉